

凡尔纳《二十世纪的巴黎》中技术理性与自性危机的诠释学解读

卜晨浩,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MEC.2026030001

摘要： 凡尔纳《二十世纪的巴黎》讲述了在 1960 年代技术高度发达的巴黎，年轻诗人米歇尔因坚守诗歌与古典人文理想而被社会排斥、最终在雪夜昏倒于公墓的悲剧故事。保罗·利科的诠释学框架可以揭示技术理性如何剥夺世界的可栖居性。技术理性的诗学症候、叙事身份的崩解与抵抗、文本作为“世界提案”的诠释学功能三个维度，系统呈现了这一剥夺过程及其内在抵抗机制。人文素养的本质并非知识积累，而是主体向文本开放并接受“更宽广的自性”的存在论能力。

关键词： 《二十世纪的巴黎》；凡尔纳；利科；技术理性

A 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Crisis of Ipseity in Jules Verne's Paris au XX^e siècle

Bu Chenhao,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Jules Verne's Paris au XX^e siècle tells the tragic story of a young poet, Michel, who, in th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Paris of the 1960s, is rejected by society for adhering to poetry and classical humanistic ideals, ultimately collapsing in a cemetery on a snowy night. Paul Ricœur's hermeneutic framework reveals how technical rationality deprives the world of its habitability. The three dimensions—the poetic symptoms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istance of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hermeneutic function of the text as a "proposal of a world"—systematically present this process of deprivatio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he essence of humanistic literacy is not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but the existential capacity of the subject to open itself to the text and accept a "wider ipseity".

Keywords： Paris au XX^e siècle; Jules Verne; Ricœur; technical rationality

引言

自 19 世纪以来，凡尔纳在法国及国际学界主要以“科学预言家”和“冒险叙事大师”的身份获得关注，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其科技预见的准确性、叙事类型的归属以及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性解读。法国“儒勒·凡尔纳协会”与学术刊物《凡尔纳研究》（Verniana）自 20 世纪中叶起持续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系统化建设。然而《二十世纪的巴黎》直至 1994 年才正式出版，引发学界对其反乌托邦维度与人文批判意涵的集中讨论，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主题层面的描述与历史语境的还原，尚未借助严格的哲学诠释学框架对其深层叙事逻辑加以分析。另一方面，保罗·利科的叙事理论与诠释学思想虽已被广泛运用于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却鲜少触及凡尔纳的文本世界。本文尝试以利科的“情节构造”理论、ipse/idem（“自性”/“同一性”）身份辩证法及“文本世界”为工具，对《二十世纪的巴黎》展开系统性的诠释学阅读。

一、技术理性的诗学症候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第一卷中，将情节构造的核心功能界定为“异质综合”（synthèse de l'hétérogène），即叙事将

行动者、目的、手段、情境与意外结果等异质因素整合为一个可理解整体的能力（Paul Ricœur 1983）。《二十世纪的巴黎》的叙事构造，正是将技术的奇观与人文的贫瘠并置于同一个 1960 年代巴黎，使两种异质的历史逻辑在同一时空相互摩擦，由此产生出

课题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一般课题“人机协作视域下 AI 赋能吉林故事的法语教学模式研究”（编号：GH255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卜晨浩（2005.05.18—），男，汉族，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专业方向：法语。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

小说的根本张力与批判力量。这一异质综合并非静态的对比，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叙事运动。技术理性的全面胜利与诗性素养的逐步崩解，相互缠绕，构成了凡尔纳文本最深层的情节动力。在利科看来，这种情节动力成为可能，有赖于诗人与读者之间共同分享的“前理解”（*pré-compréhension*）。凡尔纳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经济的叙事笔触完成如此深刻的文明批判，正是因为他与他的读者共享着对人文传统之价值的前理解，而这一前理解在他笔下的1960年代已经被彻底摧毁。

小说的批判基调，在开篇便已奠定。凡尔纳细心地列出“教育信贷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Instructionnel*）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银行家、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参议员、宪兵上校、国会议员，但“没有一个科学家或教授的名字。这对于一项商业事业而言更令人放心”（Jules Verne 1994：29）知识的担保人被资本的担保人所替换，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一次变革，更是整个社会认知秩序的根本性重组：“优美文学、古典语言——包括法语——的研究已几乎被牺牲殆尽；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已死的语言，不仅是死语言，更是已被掩埋的语言。”（Jules Verne 1994：29）“死而且已被掩埋”的双重否定标志着某种历史性的遗忘，意味着古典学的衰退，更意味着整个文明记忆机制的关闭。

凡尔纳对布塔丹（Boutardin）舅舅的刻画，将这一时代的精神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人类学图像。凡尔纳写道：“斯坦尼斯拉斯·布塔丹先生是这个工业世纪的自然产物；他是在温室里催生出来的，而非在自然中生长；他是彻头彻尾的实践之人，只做有用之事……他以克和厘米来表达自己，并且无论何时都随身带着一根公制手杖……在他看来，绘画止于水彩渲染，制图止于几何草图，雕塑止于模型翻制，音乐止于火车头的汽笛声，文学止于股市行情公报。”（Jules Verne 1994：46-47）“公制手杖”（*canne métrique*）将测量理性具身化为一件随身器具，使世界在布塔丹的认知宇宙中彻底化约为可量化、可计算的对象集合。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将这种认知模式称为“第一层级指涉”，即将世界视为“可操纵对象的集合”（*ensemble d'objets manipulables*）的认识方式；而文学与诗歌的独特功能，正在于通过废除这一层级的指涉，解放另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即“第二层级指涉”，在此世界中不再显现为可操纵对象的集合，而是显现为我们生命与谋划的视域，简言之，显现为生活世界，显现为在世存在。”（Paul Ricoeur 1986：58）布塔丹的“公制手杖”，正是对“第二层级指涉”的彻底关闭。他将“文学”化约为“股票交易所公告”，他不是不读文学，而是以第一层级指涉的方式读一切，使一切都成为可操纵对象。

二、叙事身份的危机与诗意的最后抵抗

利科在《自我作为他者》研究中指出，人物的身份并非先于叙事而存在的给定实体，而是在情节构造的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我们在小说中所跟随的，不是一个既成人格的外部遭遇史，而是一个叙事身份在压力下被检验、动摇、最终趋于崩解的过

程。与布塔丹舅舅相比，米歇尔的叙事身份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内核之上，因为它由诗歌、古典学识、对友谊的忠诚以及对露西的爱构成，是一种无法被简化为任何可量化、可测量的尺度的存在方式。

利科在《自我作为他者》中建立的最核心的概念对立，是“同一性”（*mêmeté/idem*）与“自性”（*ipséité/ipse*）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指人格中可重新辨认的稳定特征，即习惯、性格倾向、社会身份；后者指在一切稳定的“同一性”支撑都已崩塌之后，能在许诺与承诺的时间维度中“保持自身”（*maintien de soi*）的能力。利科以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不重合作为整个论证的核心。小说中，布塔丹是“同一性”彻底吞噬“自性”的极端形式。“公制手杖”已是他人格的全部，“自性”已被“同一性”消化殆尽。米歇尔则恰恰相反：他的“自性”在“同一性”的持续压力下挣扎。小说的叙事，正是这一挣扎由潜伏走向公开、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当社会不断剥夺他的职位、收入等，他的“自性”身份问题便愈来愈赤裸地呈现。

作品中，人文教席的存亡已经完全进入商业语法的管辖范围。当雨果、维吉尔、肖邦的名字被集体遗忘，构成文化身份之他者维度的整个参照系正在瓦解，而没有这些参照系，“同一性”身份就会消亡。然而在这片颓败之中，米歇尔与露西·里什洛的相遇构成了小说最重要的乌托邦时刻：“这个少女是活生生的诗；他感受到她胜过看见她；她在他的眼睛之前就已触动了心。”（Jules Verne 1994：108）“活生生的诗”（*la poésie vivante*）的露西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以具身形式保存着“第二层级指涉”的存在，是那个“可栖居的世界”尚未彻底消失的最后证明。正是对露西的爱与对诗歌的承诺，使米歇尔的“自性”在“同一性”全面崩塌之后仍然得以维系。当米歇尔被驱逐出“大戏剧仓库”、陷入彻底的贫困，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想出版一本诗集，非常无用，但非常美丽，于是他不停地工作，几乎在挨饿，思考着、梦想着，睡觉也只是为了继续做梦。”（Jules Verne 1994：152）“无用”不是对诗歌的贬抑，而是对“有用性霸权”的主动反驳。在极度贫困中继续写作无用而美丽的诗是一个人不依赖任何“同一性”支撑的纯粹“自性”姿态。

“文学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思维实验实验室，叙事身份的变奏资源在其中接受叙事的检验。”（Paul Ricoeur 1990：176）凡尔纳的实验在这部小说的终章达到最彻底的时刻。在蒙帕纳斯公墓，米歇尔读到肖邦、古诺的名字；在拉雪兹公墓，他将最后的紫罗兰放在缪塞的坟前，然后在巴黎的雪夜中，以双重的呼喊结束：“‘哦！巴黎！’他带着绝望的愤怒手势喊道。——’哦！露西’，他低声说着，昏倒在雪地上。”（Jules Verne 1994：168）对巴黎的愤怒呐喊，是“自性”对整个技术理性秩序的最后拒绝；对露西的轻声呼唤，是“自性”向他者发出的最后一次开放。而在利科的诠释学中，正是这种向他者的开放，构成了“自性”身份最深处的存在论结构。但当“同一性”被彻底剥夺，那个仍然昏倒在雪地上、仍然呼喊着露西名字的人，是否还构成一个“自性”的主体？

三、文本作为世界的重新开启

那么，凡尔纳的这部文本究竟向读者传递了什么，与人文素养的本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将文本诠释的真正对象界定为：“在文本中需要诠释的，是一个世界的提案，一个我可居的、并可将我原本己的可能性投射其中的世界的谋划。”（Paul Ricœur 1986：58）在这一界定之下，《二十世纪的巴黎》向读者传递的，并非一个预言性的未来事实描述，而是一个关于存在处境的根本问题：在一个技术理性已经占领了全部生活空间的世界里，人是否还可能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可栖居”的存在方式？小说以虚构的方式提出疑问，因为只有虚构能够通过废除对日常现实的直接描述，解放一种更深层的参照功能，使世界不再呈现为“可操纵对象的集合”，而是作为“我们生命与谋划的视域”得以显现。

《二十世纪的巴黎》1863年写就，1994年出版，中间横跨131年的沉默与疏离。利科说“疏离并非方法论的产物，因而也不是某种附加的、寄生的东西；它是作为书写的文本现象的构成性要素；同时，它也是诠释的条件。”（Paul Ricœur 1986：125）疏离是诠释的条件，而非诠释必须克服的障碍。《二十世纪的巴黎》所经历的131年沉默，因而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它作为批判性文本的效力。当它于1994年重新进入读者手中，它已彻底脱离了原始的历史语境，即第二帝国的科技乐观主义，并得以在数字时代前夜的全新语境中被重新语境化。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新的“疏离后的语境化”，都使这部文本获得新的批判锋芒。

这一形变过程，在利科那里被最终凝聚于“占有”（appropriation）与“解占有”（déappropriation）的辩证运动之中：“占有，就是使原先陌生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被占有的，

正是文本的所指之事。但文本的所指之事只有在我解占有了我自己、以便让文本的所指之事存在时，才变成我自己的。于是我以自我、自身的主宰，换取了自性、文本的门徒。”（Paul Ricœur 1986：60）阅读不是将一己既成的理解强加于文本，而是向文本敞开，以“文本的门徒”换取“自身的主宰”。这一交换要求读者暂时悬置布塔尔丹式的“第一层级指涉”，允许“第二层级指涉”以其全部的批判力量运作。利科对此给出了最终的表述：“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身。”（Paul Ricœur 1986：130）这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人文素养”的最终界定：它不是某种可量化的知识储备，而是这种主体性向文本开放、愿意接受“更广泛的自性”的能力。《二十世纪的巴黎》中那个被彻底技术化的巴黎，其最深刻的悲剧恰在于：它的公民不再“在文本面前理解自身”，因为文本已从他们的世界中消失。而凡尔纳的叙事之所以在一百六十余年后仍然构成一次真正的文学事件，正在于它所开辟的这个批判性的自我理解空间，今天依然向每一个愿意成为“文本的门徒”的读者敞开着。

四、结语

《二十世纪的巴黎》并非一部关于技术进步的预言，而是一次关于人文素养之本质的叙事性追问。通过技术理性的诗学症候、叙事身份的危机与诗意抵抗，以及文本的诠释学开放性三个维度，凡尔纳的小说与利科的哲学形成了深层的理论共鸣。人文素养既非可量化的知识资本，亦非一种文化趣味，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能力，换言之，要向文本开放，以“文本的门徒”身份接受“更广泛的自性”。在人工智能日益重塑知识生产方式的当下，这一能力的意义较之凡尔纳所预见的196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参考文献

-
- [1] Paul Ricœur. Temps et récit, tome 1: L'intrigue et le récit historique[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3.
 - [2] Paul Ricœur.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 [3] Paul Ricœur. Soi-même comme un autre[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0.
 - [4] Jules Verne. Paris au XXe siècle[M]. Paris: Hachette / Le Cherche midi, 1994.